

三农中国

第 12 辑

2008年10月版

- 温铁军 发展中国的发展问题
李昌平 乡村治权与农民上访
贺雪峰 中国城镇化战略反思：反对积极城市化战略
罗兴佐 对农田水利政策的反思
申端锋 税费改革解决了什么问题
王 丹 “两免一补”政策——来自基层学校的声音
徐 勇 《农民工口述史》序言
张孝兰 在深圳的两年
徐杰舜 《黄河边的中国》前后的故事
——曹锦清教授访谈录（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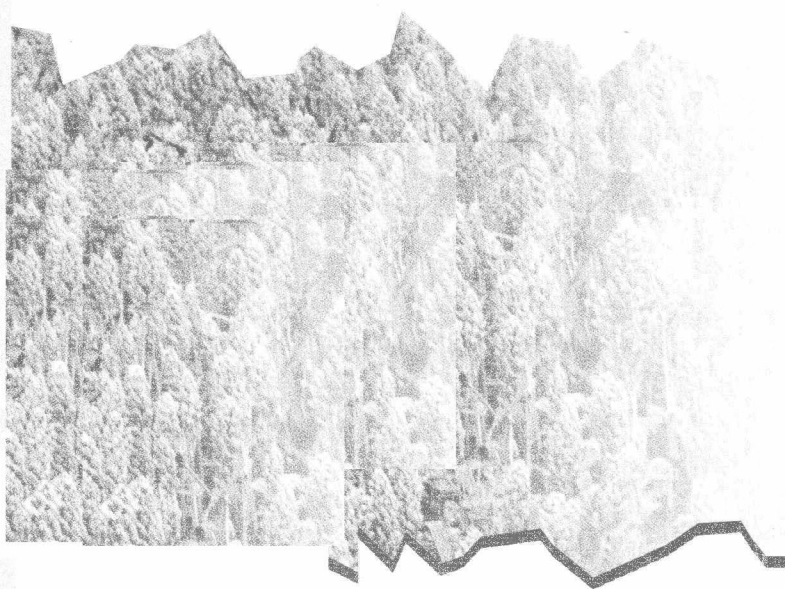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8年10月版

三农中国

主 编 贺雪峰 出版策划 窦鸿潭

第 12 辑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农中国·总第 12 辑/贺雪峰主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9

ISBN 978-7-216-05748-6

I. 三...

II. 贺...

III. ①农业经济-研究-中国

②农村经济-研究-中国

③农民-问题-研究-中国

IV. F32 D4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3794 号

邮购电话:(027)87679639

E-mail:hbpp1502@163.com

hs9999@vip.sohu.com

三农中国 总第 12 辑

贺雪峰 主编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孝感市佳丽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72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10.25

版次: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66 千字

定价:16.00 元

书号:ISBN 978-7-216-05748-6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三农中国网址:<http://www.snzg.net>

目 录

本期特稿

温铁军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 / 3

三农评论

李昌平 乡村治权与农民上访 / 16

贺雪峰 中国城镇化战略反思:反对积极城市化战略 / 19

罗兴佐 对农田水利政策的反思 / 23

申端锋 税费改革解决了什么问题 / 30

马 威 农村社会伦理病症的现代性解读 / 36

王 丹 “两免一补”政策——来自基层学校的声音 / 42

三农杂谈

赵旭东 乡村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重新回味费孝通的“双轨制” / 49

熊万胜 也谈农民的“善分不善合” / 55

李云雷 失语者的声音——当代底层文学 / 60

农村调查

王晓毅 《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冲突》引言 / 73

汤安中 离开了六十年的小渠村 / 85

王启梁 巫术是如何形成的——云南曼村的故事 / 93

欧阳静 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历史性抉择
——基于对J县老年协会与地下教会的调查 / 101

徐 勇 《农民工口述史》序言 / 109

张孝兰 在深圳的两年 / 112

田先红 打工给坪村带来了什么 / 121

三农人物

徐杰舜 《黄河边的中国》前后的故事——曹锦清教授访谈录(三) / 126

张 军 最早关注“三农”问题的中国经济学家何廉 / 136

新闻旧事

张德元 农民父亲——纪念“分田”三十周年 / 145

吴重庆 孙村的民生日用——乡土社会的“小写历史”(之六) / 150

杨 华 最后的乡村“礼生”——记述我的伯父杨书煌先生 / 157

发展中国的发展问题

温铁军

20多年前的1985年,大家都在研究大包干以后的农业发展、粮食结构调整等问题的时候,我就开始研究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事情。20多年后,当人们都在大声疾呼城乡统筹、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和加快城市化时,我反而倒显得保守了。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大家,城市化是一种趋势,但并非必然趋势。城市化也并不意味着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我们切不可眼中有“数”而心中无“人”。

这些年来,因为这些说法,我在社会上受到了很多误解,今天想利用这个场合,用点时间跟大家多说些相关情况。

一、题解:城乡统筹中的“城”与“乡”

(一)城:“城乡”统筹好!但“城市”统筹了吗?

城乡统筹当然好,但是,最容易统筹的城市内部统筹了吗?我们讲“城乡统筹”,首先统筹的应该是城市内部。

比如,城市中的农民工群体,被所在的城市真正的容纳进来了吗?有一个打工青年艺术团,创办之初被工地的老板打,被黑社会欺负,现在终于得到了团中央、文化部等的肯定。这张图片是他们的网站。我在旁边加了一句话:“国家大剧院是……?”现在电视上如此火爆的国家大剧院,如果不包括2亿左右的流动打工者,那么它是什么,是国家的吗?是人民的吗?

(二)乡:“农业现代化”与“现代农业”之辨

今天我们强调城乡统筹,集中农民上楼,节约土地用于规模化生产,在发达国家,特别是比较强调多样化、多元化、生态和环保的欧洲,现在的农业是什

么样子呢?已经变成景观农业了,强调农业的多样性。昨天张红宇司长讲了“现代农业”的概念,我想他的观点应该是对的。当现代农业提出来的时候,我们自己还没有转到这个方向上来,海外已经来找我们说,中国终于出现了农业政策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开始把农业政策调到了欧盟1990年代末或日本1980年代末开始强调的内容。

我们知道,世界上农业开始追求产业化、商品化、区域化、规模化等一系列的“化”,是在1930年代以后福特主义大生产成为工业的主导趋势,并且由于工业是强势产业而影响到农业,从而把农业的指导思想变成了产业化、商品化、区域化、规模化……其实,就是在1930年代以来的短短半个世纪,人们把农业搞成了立体交叉污染最严重的、制造了严重负外部性的产业。而经济学早就指出,传统农业,尽管其生产者未必能得到很高的收益,但因为其和自然过程高度一致,所以是一个正外部性最大的农业。当福特主义大生产从美国席卷世界的时候,小农经济国家也跟着要搞农业产业化,农业尽管短期内能为生产者增加收入,就像我们今天讲的“千方百计让农业为农民增收多作贡献”,但结果是什么呢?是由于农业脱离了和自然性状相结合的基本特征而造成了负外部性最大化。今天中国农业已经成为面源污染占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污染行业。农业在制造污染的时候还制造着食品不安全,严重威胁着每一个人自己乃至子孙后代的安全,今天我们大家都看病吃药,因为我们把农业化学化了,“家家都种卫生地”——谁都不愿意使农家肥了,而是使用化学农药、除草剂;“户户都养化学猪”——使用重金属抗生素,还加上点“蒙汗药(激素)”。最近一个国际组织发表报告说,大城市周边的大规模养殖场(如万头牛场万头猪场等)中,牛、猪联合起来打嗝、放屁排出的污染物对大气的污染程度比城市里的汽车尾气污染还严重。很多人以为不可能,其实是真的,当然两种“气”的化学成分不同。

当我们追求这种化学化的时候,欧盟、日本因为农业规模小,早就告别了福特主义大生产。日本政权上著名的“阿角”田中角荣曾提出一个理想,要使日本农民规模达到户均2公顷(这和中国人“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梦想是一样的),但是日本直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都没实现,于是田中角荣提出“国土整治论”,从此日本开始了大规模的新农村建设,谓之“农村综合整治”,于是乎,80%以上的农田实现了灌溉,达到了户均2公顷。在这个阶段上,他提出了农业政策转向,即不再追求农业收益,不再让农业为农民

增收,也不再追求农业作为一个产业的发展,而强调农业是区域发展中的一个部分,强调食品安全、区域发展和农业经济。这是日本 1980 年代农业政策调整后再现的“三农”问题。

中国的农业被我叫成“三农”问题是在 1996 年,距今 11 年多。而日本早在 1980 年代就强调“三农”问题了,只不过内容不同。日本转向后,带动韩国和中国台湾也跟着转向。

继日本之后的是 1990 年代欧盟政策的调整。欧盟农场规模大于日本 5 倍以上,大约在 10 公顷以上——欧盟各成员国内部不一样,但平均规模比日本要高很多——因此欧盟转向晚于日本,到 1996 年开始转向。

恰恰是在 1996 年小农经济和小农场国家顺应规律地转向时,我们逆向了,食人牙慧,开始强调农业产业化,强调农业要提高效率。于是乎,造成 1990 年代农业化学化程度大幅提高,亩均化学化程度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当然造成严重食品不安全,于是带动了整个医药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都核算进了 GDP,结果不是害了大家吗?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认真思考,但我并不批评,因为当年研究产业化问题的人中也有我一个。我的那份产业化研究报告,可能是国内研究农业产业化的第一份报告。姜春云同志到中央主政农村工作,我当时在农业部农研中心。搞政策研究要揣摩领导意图,我们就分析领导同志会怎样开展工作?我说第一脚肯定要踢农业产业化,农研中心为领导服务得先做农业产业化研究。大家都不认同,说什么叫农业产业化?农业本来就是产业,产业的产业化,同义反复,连起码概念都不懂。在我的坚持下立了项,做了一份农业产业化报告,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衡量农业产业化成功与否的标准,不看政府是否增加税收,不看企业是否增加利润,而看农民作为生产者是否分享了社会平均收益,这是衡量产业化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准。请问今天有谁说产业化的时候拿这个标准说话?没有。不仅提出了标准,全国人大转到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大企业进入农业的提案,也是转到我的手中批复的,这些说来话长,按下不表。

“新农村建设”中的“新农村”是什么?图片(作者发言时演示,此文未附。编者注)是我们的生态建筑,这是生态办公室;这是地下礼堂,能坐 300 人,像大棚一样的,冬天不用暖气,夏天不用空调,因为是半地下的;这是生态农宅,大约 180 平方米,建筑材料成本只有 2 万多元。我们没有使用钢筋水泥,所有

这些基本上都是木结构,草土墙,全部建材都可以回收,以此形成农村的生态化。

我们这些事情做完了两三年之后,刚刚闭幕的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其内涵是人类社会将步入生态社会,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大概对以往所犯的错误能有所挽救。

二、重新构建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分析框架

依据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这个指导思想,我们应该重新建立分析框架,来看看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一)认识论:一元论向多元论的回归

一个重要观点是从一元论回归到多元论,即把世界本来的多元这样一种客观事实重新加以确认。

生态文明是个内涵性的改变,它首先改变的是认识论。要认识到世界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认识到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是单一的五个阶段论的线性,就像我刚才说城市化是一种发展过程,但不是必然的、惟一的一般的发展过程一样。我们多年来被这样一条单线式的思维禁锢着,这使我们很难突破,很难创新。而生态文明的提出,对于所有的学科来说,都需要重新构建其分析框架,这样我们才能回归到社会和物质世界的本质上。五个阶段论与亚细亚形态在1930年代的中国曾发生论战,随着强调马克思自我反思亚细亚形态的这批知识分子被打成托派,中国就变成了一元论的、单线式的五个阶段论的单线思维。

多元论的发展本是世界的常态,只有理解和包容才能和谐。

(二)重新梳理不同的人类发展路径

我们今天的社会科学理论其实是西方中心主义一元论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是中世纪宗教神学的产物。(当各位都在自己的学科中勤奋耕耘的时候,千万别耕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家的“田”。)包括美洲、非洲、亚洲等非地中海文化的多神宗教、多元社会,存在着与西方不同的人类历史发展路径。

非洲、拉美、南亚,都被殖民化了。非殖民化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制度形成,还是制度改进,最终总是受到有社会历史内涵的一定文化因素的制约。中国属于黄河文明,而西方属于以欧洲为中心的海洋文明,这就是为什么党中央

在强调一个概念的时候总是要加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原因,包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也和日本不一样。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梳理不同的人类发展路径,形成不同的人文社会科学思考,然后才有新的分析框架。

1. 西方中心主义文化

西方中心主义文化的个体特性,是以地中海特殊的资源环境为条件的早期西方文化。它内涵着早期采集和狩猎的生产方式,必然形成个体为基础的社会文化表现以及后期的冲突、契约命题。除了西方以地中海沿岸为主的文明外,所有其他各大陆都不是这样。

我想讲一下文艺复兴和吃娘奶长大的故事:

中国曾经发生过网上热炒中国的教科书属于吃娘奶长大的故事。在欧洲,随着文艺复兴,“吃娘奶长大”的概念其实得到的是一种发扬光大。

古罗马就是两大双胞胎男婴靠吃娘奶长大然后建造的城市,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被中世纪以后复兴出来,其中就包括吃娘奶长大的文化内涵。(当所有这些文明被自己内部矛盾灭亡的时候,整个古罗马、古希腊就进入了2000年左右的殖民化的进程。直到1847年,当历史已经进入了近代史的时候,意大利——古罗马早期文明的发祥地——还只是个地理概念而非当代的国家概念。)所以,西方对外的杀戮掠夺,乃至于对殖民地的疯狂征占等,都是他们文化中内涵的。

文艺复兴的实物有很多。各位如到欧洲去,要去那些大的博物馆,如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日尔曼博物馆、意大利国家博物馆,在那里好好呆上几天,好好看看他们表现的是什么,文艺复兴到底在复兴什么?其实复兴的是个体文化为基因的海盗文明。其中,什么叫谈判、什么叫契约,什么叫谈判和契约之间的对立统一,乃至于今天的所谓自由契约理论到底来源于何处,在这里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都有很好的形象表现。

灌溉农业文明也有很多文化表现,比如埃及最古老的博物馆所展示的就是大河灌溉文明。

2. 真实的美国发展经验

什么是真实的美国发展经验?很少有人注意,我这里做了一个简单概括。

(1)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关门和开门。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前,是个典型的殖民地国家,为欧洲提供原料,并且为欧洲提供产品市场。1865年美国完成了

南北战争,战争英雄格兰特将军当上总统,上任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关门,闭关锁国,不许对欧洲开放,“直到我们有足够的实力,我们才能重新开放”,经过30年,经历了美西战争以及美国对亚洲的侵略等,直到1890年代美国终于成为一个工业化强国,这时才重新开门。

(2)美国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同样遭遇到贫富差别、城乡差别、区域差别拉大的问题。东西两大海岸和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的差别非常大。1929—1933年的大危机,美国同样逃不过去,生产过剩必然造成危机,而危机在欧洲表现为战争,在美国表现为历史机遇,美国抓住了历史机遇,安然渡过危机并成为工业化大国。美国不用像中国今天这样费劲,因为欧战帮他解决了问题。

(3)成为金融资本帝国。因为欧战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中央银行,于是美国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成为金融资本主导的帝国主义国家。靠金融资本牟利比任何产业都轻松得多,它可以追求通过印票子占有收益。当苏东解体之后,美国就可以对全球印票子,于是全球化顺理成章地被美国倡导了。(那是资本的全球化,我们跟着嚷嚷什么呢?)

3. 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制度的后果:制度收益归谁? 制度成本归谁?

制度是不同原始积累方式所形成的,是派生物。我们强调制度,不错,我多年来一直强调制度。很多人以为当我说制度是派生的时候就不重视制度,其实我只不过指出了制度从何而来。

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制度,制度收益谁得到了? 制度成本谁来承担? 就像今天有许多人在谈论农民问题,其实农民只是没得到制度收益、而承担了制度成本而已。

这种单极主导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发展极端不均衡,从而引起的极端对立,结果一定不会是好的,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拉美国家开始左倾化甚至游击队遍地。我先后到这些游击区去过好多次,目的就是为了考察为什么在美国的家门口,完全照搬美国的制度反而闹得社会不得安宁、游击队很强大?

三、 发展中国家的比较

(一) 城市化的一般比较

当城市化成为一种必然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比如发展中国家的城市

化是靠贫民窟实现的？

做一点比较就可以知道，当我们讲着一系列“化”的时候，很少去做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孰不知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很少有人去想，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人口超过1亿的大型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城市化加速的过程中都必然出现的大型贫民窟？我们在一些老工业城市，过去的工人区也已经变得贫穷了，但这些产业转型期间形成的贫困，但并不像印度、孟加拉、巴西、墨西哥等这些国家的贫民窟。二者差别是很大的。那些贫民窟动辄上百万人。

非洲等地一些后起的国家也在追求工业化，比如最近闹事的肯尼亚，为什么肯尼亚闹事能一呼百应，就是因为空间平移了贫困，本来原来还是分散在四里八村的贫困，因为追赶工业化，大量人口向首都聚居，没地方呆，就呆在河沟、路边等地方，住在板皮子、棚布搭成的大面积移居区中。现有得到外援的总统，尽管掌握着国家机器——军队，而原有的总统却可以在贫民窟一呼百应。当贫民窟人口超过几十万的时候，想要对什么发言，就靠发动这些贫民窟的百姓上街。中国现在是2亿左右的进城打工人群，如果按人数算，我们进城打工的打工者数量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人口，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出现这些事情？当然个别事件另当别论。比如当年重庆万州区的“棒棒”事件，也是因为偶然的事情，导致了参与冲突者并非利益相关者，他们在冲突过程中并非要索取好处，他们没有利益要求，只是参与，为什么？我不多说，有的是文章分析这些事，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些事情，在座的很多干部也对付过上访者，我们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在中国还没有演变为大规模冲突，其背后的重要原因在于我们今天都认为是绝对负面的体制——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千万别只讲一面。我从1985年开始强调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二十多年之后我开始保守了，开始希望放慢脚步，不要一味强调城市化，甚至建议是不是有可能以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间县域经济的发展带动城镇化？而不要只讲城市化。越来越退步，越来越趋向于保守，什么原因呢？就是怕乱。在座的各位恐怕大部分都属于“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后，一个重要的诉求就是稳定，谁都怕乱，乱起来大家谁都受不了。而如果我们做法过于激进，我想中国的问题的基础远远会大于一般发展中国家。

（二）私有化的中印比较

印度与中国最具比较分析价值，两国起点相似，相差在哪里？在于基础设

施。印度到现在刚刚开始建高速公路,原来我去之前就听人说印度是个高速公路“零公里”的国家,我到了一看,果然。现在各个邦还不行,到各个邦去的时候,别想着遵守时间——都说印度人不遵守时间,是因为没法遵守,路是混行的,公共汽车顶上人都是满满的,路上马车、驴车、牛车、拖拉机混在一起,中间连分道线都不能划,因为没有划的地方;出一个事大家就停在那儿,在路边埋锅做饭,一天都走不了——在印度讲究效率,那是不可能的。

印度农村的多子女家庭,住的是茅草房,进去后屋里连张床都没有,农业没有任何机械、没有畜力,只能用人力来耕地,非常贫困。回来后我对我的学生们说,谁想了解1930年代的中国农村,谁如果觉得过去好,就去印度;谁想了解1980年代的中国农村,去越南。希望官员们再组织代表团的时候,能去这些国家的农村考察考察,这样能够加深各位对我们社会主义伟大祖国的热爱。

印度与中国发展差异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础设施的不同。印度的交通非常糟糕,任何一个路口就是汽车、摩托车、摩的甚至牛挤在一起,交通规则是很难遵守的,大家都是在抢。城市化不过是多出点装饰多出点广告而已。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交通、没有基础设施、没有三通一平,没有起码的前期投入,不可能有FDI和其他发展类投资。中国为什么能长期靠投资拉动?一个重要条件是基础设施,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是世界第二。

印度没有基础设施的原因是土地私有化。农村土地私有化,造成了印度34%无地农民,就跟中国解放前造成了37%的贫民和雇民相似。7亿农民人口中的34%,就是2亿多无地农民,他们干什么呢?每当农村里有点灾的时候,他们就拖家带口进城了,进城就是贫民窟。贫民窟建在哪儿?城里土地也是私有的,你敢在私人土地上私搭乱建吗?不敢。在哪儿呢?所有的贫民窟都搭建在公有土地上,就是铁路边、公路边、河道边、公园边等等这些地方。于是,你想搞基础设施建设修条铁路搞双轨,就得拆棚子,一拆就是上百万人闹事,空间平移、集中了贫困,不是等着人家和你打架吗?

想修铁路、修公路,把棚子拆到哪里去?都是老百姓。想把河道裁弯取直让它行程通畅,免得一下雨就是暴雨成灾,淹没半个城市,你敢吗?沿着河(河道都是曲里拐弯的)都是底下用竹竿子撑着,上边是竹篾子搭成顶子的棚子,成千上万的人就住在河道两边,因为那是公有土地。请问,我们主张土地私有化的朋友们想过这个场面吗?去实地看看吧!不远,5个多钟头就到了,从你

们成都走更近,大概3个多钟头就到了;也不贵,几千块钱就够了,我有很多次考察都是自费去的。

两国经济发展情况的比较。以前中国经济大起大落,那是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印度经济始终平稳,但它平平稳稳地走到现在,和中国的差距越拉越大,拉开差距的喇叭口,最早是在1969年,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但不管怎么讲,中国就是在那个时候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进入工业化快速增长期。从此,中印两国差距越来越大。

经济结构的比较。2005年,印度服务业已经高达53%,而中国的服务业还在40%左右徘徊着。从结构上看,中国大大地落后于印度,但是从制造业来看,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战后追求工业化的路径来看,中国的制造业比重是46%,印度一直不到30%,也就是说,印度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当然,如果用生态文明的角度来讲,没有完成工业化并不意味着他不好,不进入工业化并不意味着不好也许会更好,这话另外再说。

我主要是想告诉大家,不要看什么意识形态,而要看真实的发展情况,今天很多企业家在中国都说,中国的制度不好。当他们出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发现他们寸步难行,甚至有很多已经被抓了。我到印度去调查的时候,企业家们在那里没法干,稍微让工人超过8小时他就罢工了,然后就把你告进法院了。要是稍微拖延给钱,就进监狱了,还得花好多钱保出来。

20年的减贫比较方面,中国的减贫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不需要多说了。

(三)工业化的共同规律

大多数20世纪以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都以工业化为主要目标。工业化都需要一定的资本原始积累。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一边是城市的资本原始积累,一边是农村的剩余提取结构和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就是从农业、农村、农民提取剩余积累。所谓三农问题,是因为加快工业化提取积累等种种历史和社会原因造成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与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工业化的情况是一样的,这样的态势为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工业化“两个阶段、两个反哺”论断做了注解。中国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即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是农村支援城市,农业支援工业,就是城市工业从农村提取原始积累;工业化到了中期阶段,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于是就顺理成章地提出要城乡统筹。工业化到了中期阶段,农业产值下降到14%,农民对GDP的贡献非常

低,农民收入也相对下降,两个“下降”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需要政府启动两个“反哺”。这跟现在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纷纷要求发达国家免除债务、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扶贫投入,道理是一样的。

任何发展中国家追求工业化、城市化加速的时候,只要不能像西方人那样向外转嫁矛盾,就一定会导致本国农村的衰败。什么道理呢?有一次我跟领导同志讲,请问为什么1980年代中国没有三农问题,1980年代农民收入连续四年增长速度快于城市,城乡差别迅速缩小,并且第一次出现了农村人口(县以下)的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高达64%(没有扣物价指数),即农村人口占多大比重消费占多大比重,然后中国出现了黄金增长、内需拉动?为什么1990年代市场化、法制化都加强了,三农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到21世纪,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但三农问题仍然是重中之重呢?

就因为这里有一个基本规律,特别有请学经济学的朋友们注意:当这个世界进入金融资本主导国际竞争的时候——金融资本的特性是在流动性不断加快的过程中获利,我们就会出现金融资本因追求流动性而异化于产业资本,越是没有流动性的产业越是被异化。而农业正是一个毫无流动性而言的产业——农业必须和自然过程结合,除了那些大棚生产可以有流动性外,正常的农业生产,只要是和自然过程结合,只要是生态的、有机的,就一定没有流动性。因此,金融一旦成为一种独立的资本,追求流动性获利,就会大量投入股市、期市、房市这三大投机市场,并且不断催生金融衍生品交易,此乃金融资本主导竞争的当代经济的基本规律,可逆吗?不可逆。既是规律,就只能运作下去。接着,就会出现中小企业因流动性差而没有贷款,农业因流动性差没有贷款。金融离农而去、离中小企业而去,乃是规律之现象,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这种规律就会导致农业三要素大规模流出。大家都知道,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资金或曰资本是父母结合生的儿子。现在,不孝子先离农而去,“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是当今普遍的话;离走后开始休爹娘,于是,“爹跑了娘嫁人,儿子各人顾各人(异化了)”——“娘被霸占”是指土地被征占,“爹跑了”是指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村三要素流出能不衰败吗?我当时问领导,世界上可曾有过任何经济领域,在三要素净流出而且大规模净流出的情况下,能保持不衰败?那不是奇迹吗?这就是今天的事实,对不对?三要素净流出并且大规模净流出,想不衰败怎么可能?因此“三农”问题是必然规律,不管我们有无善政、有无善意,这也是不可逆的。

(四) 中国经验

在这个规律发生作用的同时,加上西方的新“四化”——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会是什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中国大概是惟一的例外。我在很多国际场合上都说,请你们注意,中国是二战后独立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中,惟一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其他没有一个。比如南亚,人口过亿的有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勒斯坦、孟加拉,完成了吗?拉美国家中人口过亿的有两个——巴西和墨西哥,但这两个国家都不是以原住民为主的,而是混血人口的国家。总之,请大家注意,发展中国家原住民超过1亿的国家中惟有中国完成了工业化。是不是好事我不说,因为生态文明理念下我们不能说就我们自己有多好,但是,有谁认真总结过我们的发展经验吗?很少。前不久英国国际开发署要撤离中国(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召集一些专家来讨论,他们能把什么样的中国发展经验带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因为他们要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做项目。在座的所有专家都说,千万别带中国经验走,几乎没有一条可以带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我前阵子去印度,那里很多朋友跟我说,抓紧写篇文章吧,写印度不能向中国学什么。就像我们不能搬西方、搬来就糟糕一样,别的国家也不能搬我们、搬我们也糟糕。

四、城乡统筹的内涵

以上分析的结论是:任何照搬城市上层建筑都会由于治理成本过高而导致与过去剩余过少的小农经济不适应。这个上层建筑如果是在城市,搬吧,我们不管;但如果搬到农村来,麻烦,因为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这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以,我们需要实事求是讨论真问题。

真问题是什么?中国地理上本身就具有三级台阶分布,因此,区域差别乃是资源、地理、环境造成的,并非人为的制度造成的。中国只有11%~12%的国土面积是平原,只有9.4%~9.8%的面积是水土光热匹配的平原地区,因此,农业条件比较差,中国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是农民大国。

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在近百年的制度史上,导致了三次乡土社会的治理危机。

今天当我们讲城乡统筹的时候,城乡统筹的真正内涵是什么?是由政府承担农村的公共开支和基础设施开支。这一点,2002年党的十六大刚一召

开,胡锦涛总书记就讲到了,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就在十六大提出“城乡二元结构”的概念并且强调以“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为指导思想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就说:“我看,今后的三农政策不能再口惠而实不至。”怎么解决呢?他说了两个方面。一是把财政的新增部分投到县以下,去解决县以下的公共开支问题,就是教育、医疗、治安、管理等,这些要靠国家财政投入来支付,不要再让农民拿钱了,即公共品要公平。这一点2002年就提出来了。第二条,“国家支农资金能不能改一改?以往70%以上都投到大项目上,跟农民没什么关系还要农民付出代价,今后能不能改成国家支农资金重点投到村以下,去解决和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的小的项目需求,即农村道路、水利、电力、交通等,小的基本建设需求也要由国家支农资金来解决,也不要让农民再加重负担了”。这届领导班子的指导思想是清楚的,就是用国家“看得见的手”改善三要素净流出并且大规模流出这一农村必然衰败的规律性原因的源头,就是用“看得见的手”让三要素回流。

什么道理呢?市场一定是把三要素抽走的,靠市场是不能让三要素回流的,这点大家都清楚,叫作市场失灵。当你使用看得见的手逆市场而动的时候,由政府把三要素送回来,把率先异化于农民的不孝子用国家的手给送回来。农村小项目大量增加,就是请农民在家门口打工,参加道路、水利、电力等这些建筑工程,挣了现金,有了消费,拉动中小企业发展,小城镇发展,就有公共设施的投资需求,进而会使中国农村城镇化成为第二大资产池,就像朱镕基同志1998年启动第一大资产池建设带动了大量FDI进入中国使得中国变成投资拉动型增长一样——假如我们的新农村建设能以城乡统筹为基本内涵,并且像温家宝总理所说,连续投入十几年。温总理说:“我看新农村建设不能搞两三年,要搞就要搞上十几年。投资在现有基础上每年要增长,连续投入十几年。”这在最近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经济工作会议、党的十七大都有体现。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讲得很清楚,就是要加强三个投入,“三个只许加强,不许减少”——好政策只许增加、不许减少;支农投资只许增加、不许减少;财政用于农村公共品开支只许增加、不许减少。

2002年十六大之前很少出台社会政策,2003年之后表达政府善意的政府善举、善政大量增加,2007年增加得最多。我们看到最近几年中央出台的这些社会政策的背后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从2003年以后陡陡地向上增加,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两个反哺”的贯彻。